

地图政治：殖民帝国制造“新国家” 地图边界的意图与边疆纠纷*

白帆

[摘要] 欧洲的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最早开发了地图的政治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这些殖民帝国在独立的“新国家”领土上撤退的同时，为它们划定了地图边界线。这些所谓根据“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划定的地图边界，使得新独立国家之间产生了诸多边疆纠纷。梳理殖民帝国发挥地图政治功能的过程，探析它们为“新国家”划定地图边界背后的意图及其诱致的边界争端，可以窥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控制后发国家的秘密，也有利于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危害。

[关键词] 地图政治 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 新国家 边疆纠纷

边界精确的领土观念是现代国家重要的标志性特征，而能做到这点，需要借助现代测量技术的进展。斯图尔特·埃尔登指出，领土的空间概念就是伴随科学革命出现的，领土不仅是土地，也不只是政治战略问题，“领土包含测量土地和控制土地的各种技术。测量和控制——在技术和法律上——需要同土地和地形一起思考。”^① 这样一来，政区地图显然就成了反映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物，从历史到现实，国际上的诸多边疆纠纷往往率先在各政治体主张的政区地图上反映出来。从历史上看，操弄地图制造“地图政治”的行为，滥觞于欧洲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②（简称殖民帝国）打着“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旗号，在殖民地内部或之间确定的地图边界。所谓“科学划界”，即以所谓“科学的方式”人为地构造地图，其要害在于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地理疆界的历史问题。欧洲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科学划界”造成了严重后果：在这些殖民地各自独立成为新兴民族国家之后，边疆的纠纷成为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火药桶”。地图为何能产生如此严重的边疆政治问题？西方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如何发现并利用地图来制造这些边疆政治问题的？西方殖民帝国如此操作的意图又何在？如此划定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历史地图集”（18ZDA191）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英] 斯图尔特·埃尔登：《领土论》，冬初阳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38-339页。

② 本文采用“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的概念，旨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以领土占有为目标的“新殖民主义帝国”相区别。

地图边界导致了什么后果？对这一组前后关联的问题，目前国内学界鲜有关注^①。在中文著作中，仅于沛、孙宏年等著的《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第二章的第一节“全球格局的变化与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有所提及^②。西方殖民者“以人为构造地图的方式制造政治纠纷”的历史现象，就被称为“地图政治”。以“地图政治”这一独特的视角，分析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在“新国家”发展中操弄地图政治的意图，剖析“新国家”因前殖民帝国确定的地图边界所造成的边疆纠纷类型，有助于深刻揭露西方殖民帝国制造边疆纠纷的机制及其影响。

一、欧洲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对地图的政治运用

制作地图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学者甚至认为“绘制地图的意愿长久以来一直是人类的一项基本能力”^③，这个判断是合乎历史和常识的。虽然动物也有通过气味标注其领地的绘图行为，但“只有人类完成了一项重大飞跃，从绘图上升到了绘制地图”^④。人类在通过劳动满足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过程中需要远离家园，当活动范围不远的时候可以借助直觉回家。“但随着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地扩展，仅靠直觉来辨别方位已远不能满足人们外出远行的需要，他们开始密切关注大自然……人们开始将收集到的信息刻在白桦树皮或粘土板上。从这以后，地图的绘制便应运而生了。”^⑤ 人类借助自然物体和空间信息标记路线，从而防止迷失方向，这是地图最原始的功能。但地图不仅仅具有标识人类行动路线的功能和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有智慧的生物试图运用地图来定位自己在地球甚至是宇宙中的位置，这一直是文明史的核心议题之一。地图的直观性，显然是承载这一使命的重要工具。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指出：“对历史中的众多文化而言，地图一直是表达‘世界’（文化与个人）这两种观念的最完美工具。中心、边界和世界地图中所包含的其他相关事物，既是由这些制图者对地球上物理世界的观察所决定的，也是由这些‘世界观’所界定的……一种世界观孕育一种世界地图，而世界地图也会反过来定义其文化的世界观。”^⑥ 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人类基本上都是以大地为中心，参考天空的星座等来制作地图。所以毫不意外，这些地图基本上都反映了不同文明的

① 笔者用“地图+殖民”“地图+政治”“地图+边疆”等关键词组合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研究文献非常有限。

② 参见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3-68页。

③ James M. Blaut, David Stea, Christopher Spencer and Mark Blades. “Mapping as a Cultural and Cognitive Universa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3, No. 1, 2003.

④ [英] 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林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⑤ [美] A. G. 史密斯：《地图的由来》，吴楠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⑥ [英] 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林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页。

“自我中心”的观念^①。

地图作为路线指引的功能是不会消失的，但作为世界观的功能则随着15世纪末西方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因为这一时期的地图制作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越来越精确，区域信仰性的世界观在其中已然没有容身之地。与此同时，欧洲帝国开始了利用地图“发现”并占领全世界的运动。1494年6月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王室签署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是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利用地图瓜分世界的开端。该条约规定在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处，从北到南、从极点到极点、从北极到南极拟定并画出一条边界直线。在该线以西包括哥伦布“发现”的土地归属西班牙，该线以东包括整个非洲海岸线和印度洋全部归属葡萄牙^②。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葡、西两个帝国就宣称把地球上所谓“新发现”的土地给瓜分了！其狂悖可见一斑，更为奇特的是，该条约竟然是国际法上关于如何取得新占领土的标志性事件。杰里·布罗顿对此事所诱发的政治后果有一个入木三分的评论：“无论是在塞维利亚还是在里斯本，找幅地图或是找个地球仪，在上面画一条线代表对地球另一端的世界进行瓜分，这也和现实中的海上活动没有多大关系……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对于距离帝国中心数千公里之外的土地独占权的主张，最终也证明是完全无法维系的。但对于西欧的帝国来说，首先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接着是荷兰和英格兰，这种先在地图上，接着在地球仪上画一条线，宣示拥有那些他们君主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做法，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塑造了随后500年中欧洲对全球的殖民政策。”^③

从此，地图作为政治武器被欧洲殖民帝国运用得炉火纯青，正如马修·埃德尼（Mathew Edney）所说，“帝国是一项地图建设工程，现代地图作业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建设工程”^④。从17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后，欧洲帝国更频繁地用地图来展示它们比大航海时期更具攻击性的殖民主义，地图被用来预先确定这些欧洲帝国所谓的“先占权”。司洛尔（Norman J. W. Thrower）概括了它们利用地图占有殖民地的一种典型做法：“在海外地区的海图和地图上，其中部分由个人或贸易公司赞助完成，另一些由新创设的官方制图机构制作。此类地图文献往往通过先傲慢地描绘一个地区，并强加上一个欧洲来源的名字，然后就等同于宣示了对其之所有权。”^⑤

欧洲殖民帝国利用地图对殖民地的政治操弄不止于此。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占领不是永恒

^① Norman J. W. Thrower 在对一份亚述古地图分析中发现了这个特点，并指出，“关于这点我们只能说，其他文明也拥有以自我中心的世界观也是可以理解的”。参见 Norman J. W. Thrower, *Maps and Civilization: Cartogra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16。

^② [英] 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林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3页。

^③ [英] 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林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9页。

^④ Mathew Edney, “The Irony of Imperial Mapping”, in J. R. Akerman, *The Imperial Map: Cartography and the Mastery of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 45. 转引自 [英] 斯图尔特·埃尔登：《领土论》，冬初阳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57页。

^⑤ Norman J. W. Thrower, *Maps and Civilization: Cartogra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124.

的，但以“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人为制定的地图给殖民地划分疆界带来的伤害却影响至今。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作为英国高级殖民官员和边疆学研究者，曾经介绍了用“科学”方式人为给“现代国家”制定地图、划分疆界的三种方式：“（1）沿着一条纬度圈，或者经度子午线划分的纯天文学边界；（2）在天文坐标确定的两点之间用数学方法划定一条线；（3）参考某些既有的、人为要素和条件划定边界。”他还直白地说明了这些划界方式的核心特点与针对对象，“它们都是因政治上的便利而采用的规则，漠视自然和民族因素，并且被应用于政治共同体或者部落权益尚未定型的新国家中”。此外，他还建议，“那些人迹罕至的未开发地带，如果不必较真，也可以采用这种规则。它们在欧洲，甚至亚洲都很罕见，在这些地方长期的定居和冲突使得边界呈现为另一种形态”。然而，欧洲各国采用什么方式划界呢？寇松也毫不隐讳地指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边界都是纯粹政治性的，可以在历史事件中找到依据的”^①。寇松的“科学划界”主张事实上已经被西方殖民帝国应用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大量新兴国家的疆界地图上。其中非洲国家间的政区图体现尤为明显，弗林特（Colin Flint）和泰勒（Peter J. Taylor）指出：“最具竞争性的地区——19世纪的非洲——拥有最多的契约型国际边界。‘自然’和‘民族’的概念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种族和流域的划分方式与这里边界的发展过程大不相同。”^②

为什么对“新国家”以及“未开发地带”要采用“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制定地图确立边界，而不遵循和欧洲一样的政治——因而也是历史的、更复杂的规则？以“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确定地图边界的“新国家”会产生边疆纠纷是必然的。毕竟，任何一个地区的人们在其传统区域生存繁衍都是一个历史演化的结果，而历史又从不是按照殖民者所谓的科学逻辑来展开其进程的。因此，我们需要深刻揭露殖民帝国依照“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所确定地图边界的意图所在。

二、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在“新国家”操弄地图政治的意图

欧洲殖民帝国利用“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为“新国家”制定地图边界，其长远意图是一个需要着力分析的重要问题。虽然殖民帝国直接占有领土并给“新国家”制造边界纠纷，但这仅是殖民帝国意图的一部分，在逻辑上这种操作已然不是西方殖民帝国的主要意图。首先，在历史上占有领土的确是欧洲殖民帝国的目标，但既然它们已经承认“新国家”的存在，因而这个目标已经失效；其次，若只是让“新国家”因地图边界产生无尽的边疆纠纷，而殖民帝国无所收获，则失去了殖民行为的意义。因此，欧洲帝国给“新国家”划定的地图边界是另有所图。

^① [英]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论疆界》，张凯峰译，载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75、177页。

^② [美] 科林·弗林特、[英] 皮特·泰勒：《政治地理学》，刘云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1页。

欧洲殖民帝国的这种操作有如下几种可以称之为“深谋远虑”的战略意图。

(一) 殖民帝国政治军事控制的战略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殖民帝国在亚非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国家”，这标志着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逐步终止其领土占领行为。但这些帝国在撤退之前，显然早就有其长远规划，制造“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的地图边界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隐秘的招数。寇松的《论疆界》讲演就是这一谋划的典型文本，他直白地指明了这类地图疆界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满足这些帝国的政治军事战略控制的需要。我们可以从琼斯（Stephen Barr Jones）对寇松讲演的深刻分析中来领略其中的意图。

琼斯评论说：“我认为，任何读过此讲演稿的人均将同意帝国主义者才是此人的核心。对其而言，边界的制定很大程度是单边性的——强大、睿智、公平的帝国主义国家才能创建完善的边界。”琼斯引用了寇松自己的观点强调，“何为科学性边界？即该边界兼备了自然及战略上的优势，并且使此路径的入口及出口均置于防卫力量的控制之下，从而迫使敌人通过边界前必须占据进入的路径”。他进而认为：“科学变成了军事学，科学性边界带给某一方显然不能为双方共同所有的优势。”^① 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以“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给“新国家”制定边界，完全是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军事战略控制，从没有一丝一毫为被殖民区域人民的利益考虑过，当然更不会为这些殖民地独立后产生的争端负责任。

(二) 对“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制

每一个从前殖民地独立而来的“新国家”必然面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政治秩序安定必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欧洲帝国给“新国家”制造的地图边界扼杀了这些“新国家”政治安定的可能性。现在非洲国家政区地图的形态就是鲜明的例证。

从地图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现代非洲国家之间的界限几乎都是直线。这种政区图很显然是寇松所提到的科学划界的结果，所以，非洲国家地图也被学者形象地称为“拼图”^②。我国有学者评论指出，西方殖民者为了划分势力范围，“任意划分殖民地边界，使非洲不少部落联盟、锥形国家、酋长国、王国被完全打散，回归到氏族部落状态”^③。这个意图判断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法国学者法农（Frantz Fanon）早就指出，殖民帝国在殖民时期及退出后，在殖民地使“殖民阶段的部族制让位于民族阶段的地方主义，用制度的表达法就是：联邦制”^④。霍布森（J. A. Hobson）在分析英国殖民政策时，就指出：“基于培育自由政体的愿望来规划殖民政策，

^① [美] 斯蒂芬·巴尔·琼斯：《时空背景下的边界概念》，冯永明译，载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40-341页。

^② Robert Lloyd, “The Caprivi Strip of Namibia: Shifting Sovereignty and the Negotiation of Boundaries”, in Alexander C. Diener and Joshua Hagen (eds.), *Borderlines and Borderlands: Political Oddities at the Edge of the Nation-State*,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0, p. 69.

^③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④ [法] 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不但不是‘不变准则’，而且在英国任何负责的殖民大臣那里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准则。”^①虽然法农和霍布森均不是针对边疆纠纷来分析殖民帝国在殖民地的战略考量，但都清晰地指出，构造殖民地社会对立，牵制曾经被殖民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西方殖民帝国一以贯之的策略。因此，通过制定地图构造潜在的边界纠纷，从属于殖民帝国牵制“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三）造成“新国家”对殖民帝国规则和话语的依赖

对“新国家”来说，既然因为“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制定的地图边界诱致了边疆纠纷，能否依赖规则和平解决争端对自身的长远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是，殖民帝国早就垄断了规则体系——特别是国际法，而这些规则反映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继续采用西方规则来处理边界纠纷，无异于与虎谋皮。

美国介入非洲国家的边界争议，展示了西方国家霸权规则依旧存在。西班牙作为曾经占领西撒哈拉的殖民者，正是其构造的地图边界造成西撒哈拉领土冲突。时至2020年末，美国为了实现其支持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摩洛哥因此也将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美国以这种方式介入西撒哈拉主权和领土问题，加剧了北非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②。美国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用外交承认的霸权方式，决定一个未定领土地区的主权归属，这延续了西方殖民帝国的规则控制术，旨在强调西方殖民帝国仍是规则的制定者，世界其他地区必须遵守，但西方国家自身却是规则的例外。

“新国家”用西方规则来解决西方早先给它们制造的麻烦，构成了一个悖论。但显然还有比这更糟糕的问题，曾经是殖民地的“新国家”已经无法获知本国自身的历史，它们只能被迫把被殖民的历史嫁接到自身的“历史荣光”中，这甚至是一个普遍现象。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即便以欧洲殖民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人的所作所为也是种族灭绝性质的……我也确信，他们（比利时政府——引注）说服和再教育了许多刚果人民，使他们相信被殖民也没什么不好的”，“被殖民者常常接纳了自己被压迫的历史，甚至以此为荣”。乔姆斯基从印度、拉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时至今日，这些地区仍然遍布殖民主义的象征。他针对拉美的这个现象评论道：“仿佛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对殖民主义的鞭子还心存怀恋似的。”^③印度裔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以板球（英国殖民者发明的游戏）在印度的发展为例，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判断：“板球让所有这些（印度）群体和行动者都感到自己将这一游戏从它的英国习性中劫持到了殖民地里，无论在语言、身体、能动性层面，还是在竞争、金融以及观赏层面。”^④作为一个人类学家，阿帕杜莱的这个结论明显揭露

① [英]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9页。

② 参见《美国为何力推摩以关系正常化》，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2/14/c_1126859537.htm。

③ [美] 诺姆·乔姆斯基、[美] 安德烈·弗尔切克：《以自由之名》，宣栋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9-21页。

④ [美] 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49页。

出印度精英因改造和重整了殖民文化而产生自豪感。

曾经被殖民的“新国家”普遍地遗忘了自己的历史，甚至只能用殖民主义的话语嫁接自己的历史。借用殖民主义话语体系去应对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因地图问题诱发的边疆争端，只能导致不绝如缕的边疆纠纷。

三、“新国家”因地图边界所造成的边疆纠纷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很多国家虽有自己的边疆观念，但这与现代国家的“边界”概念特别是通过绘制地图来清晰划分领土边界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差异。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线，正是西方殖民帝国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界观念。但这些基于“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所确定的地图边界，给这些“新国家”带来了长期的边疆纠纷。

（一）因“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而构造的政区地图直接导致“新国家”领土争端不断

非洲是世界上由边界引发领土问题的主要地区。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国家之间的边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西方殖民者到达非洲之后，逐渐将现代民族国家和种族主义等概念输出到非洲地区，并采取各种强迫、分而治之的殖民手段，制造边界瓜分非洲，给非洲国家带来无休止的领土争端甚至武装冲突。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就开始针对非洲实行侵入、瓜分、划界和巩固殖民利益的策略，“19世纪初，欧洲人仍然认为，欧洲正处于一个其他诸国纷纷按照自己独特的规范与制度运转的世界……在瓜分非洲之前，‘欧洲诸国展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倾向，承认非洲诸政治团体拥有与独立国家相同的权利’……然而到了19世纪，这一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现象开始发生变化。根据布朗利的研究，这一转变是由欧美的国际法学者推动的。乃至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普遍认为，国家人格取决于承认……国家地位‘这一概念变得愈加呼风唤雨’，导致曾经被视作国家的诸多政治实体直到现在其国家地位仍未被承认。可以发现，19世纪国际法学者不断抛出的‘现代文明国家’的概念是旨在为这一变化辩护的关键举动”^①。但这种行为给非洲国家造成了诸多的领土争端。

比如，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存在未定领土的争议并引发过严重的武装冲突。历史上，法国殖民者入侵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当地之前并没有清晰的边界线。1845年，法国与摩洛哥签订《拉拉—马尔尼亚条约》，条约规定了阿、摩之间的边界，共分为三种边界情况：第一种是清晰的边界，划定从地中海南到特尼艾萨西山峰之间165公里的边界；第二种是根据种族而非领土来划定的边界，条约规定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分别管辖的部落；第三种是没有划定边

^① [英] 铃木胜吾等：《早期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西方崛起的前夜》，颜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210-211页。

界，对于没有居民的吉尔沙漠到西撒哈拉之间的沙漠地带，没有划定边界^①。后两种情况属于地图边界不清晰的情况，也为阿、摩之间边界纠纷埋下隐患。1912年，法国当局派出殖民官员瓦尔涅（Maurice Varnier）又划定一条从特尼艾萨西到菲吉格之间的一段边界，扩大了阿尔及利亚的领土，这条“瓦尔涅线”成为阿、摩之间新的边界。但是，摩洛哥并不承认瓦尔涅线，只承认1845年条约中明确划定的地中海南岸到特尼斯埃西之间165公里的边界线。此后，两国就法国殖民者未划定的界限，以及瓦尔涅线又扩大的领土范围产生领土争端，并发动了武装冲突，这成为影响北非和平安全的重要因素。

（二）殖民帝国利用国际规则和话语权继续对“新国家”地图边界争议施加影响

英、法两个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之间为确定彼此的势力范围，成为塑造暹罗（今泰国）地缘机体的重要力量。英、法确定的势力范围是通过“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的地图来确定的，因此，“制图就不再仅仅是表现空间的一种观念工具。它成为实现新的管理机制和军事目的的一种必要手段，而且，制图话语也是行政体系和军事操作得以进行的范式”^②。但正是由于殖民者人为制造地图边界导致地图划界的非历史性，引发了相关国家对某一特定领土的司法纠纷。泰国和柬埔寨关于柏威夏寺所处的边界地区的领土主权归属的司法纠纷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对这个由地图边界所诱发的边疆争议，泰、柬两国起初并没有选择极端的战争手段，而试图借助国际法院的裁决来解决问题。

1904年暹罗与法国签订了一份条约，同意在泰国（之前为暹罗）与柬埔寨（之前为法属印度支那）之间以扁担山脉分水峰为界划定一条边界线，并成立了一个边界委员会来勘界并划定该区域的具体边界。根据1904年和1907年版本的地图，柏威夏寺归属于泰国一方。然而，法国殖民者经勘界划定绘制两国之间最终的边界地图时，却把柏威夏寺划入柬埔寨一方。由此产生了柏威夏寺所属区域领土主权归属的司法纠纷，泰国与柬埔寨两国都声称对柏威夏寺所处的边界土地具有主权。国际法院的裁定认为：虽然争议地图与1904年条约存在不一致，但是不管地图是否有错误，泰国政府接受了边界现状，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反对意见；1930年泰国亲王曾对柏威夏寺进行了国事访问，柬埔寨的法国殖民官员正式接待了泰国亲王，而且该寺当时悬挂了法国国旗，这说明泰国承认了柬埔寨拥有对柏威夏寺所属区域领土的主权。但是在这起国际案件中，法庭中的部分法官对法国殖民者制定的柏威夏寺地图提出很多异议，因为这幅地图主要由两名法国殖民军官和两名技术人员完成，他们的制图仅代表了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一方，没有考虑当时暹罗的制图要求，因此该地图是存在严重缺陷的^③。

时至今日，尽管1962年国际法院已经对柏威夏寺所属区域的领土主权归属有了定论，但是

① 参见关培凤：《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解决模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7-48页。

② [美] 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袁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

③ 参见[澳] 维克多·普莱斯考特、[澳] 吉莉安·D. 崔格斯：《国际边疆与边界：法律、政治与地理》，孔令杰、张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5-206页。

泰国对此判决一直存有争议。2008年，泰、柬两国围绕该区域的归属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导致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和柏威夏寺的损坏。2013年，在海牙国际法院举行了柏威夏寺领土争议的听证会，国际法院维持了1962年判决结果的框架，裁定柬埔寨拥有柏威夏寺和周边地区的领土主权，但法院没有作出划分具体边界线的行动^①。因此，围绕着柏威夏寺的历史和现状，泰国和柬埔寨两国之间仍然存有嫌隙，两国通过和平协商来最终划清有关柏威夏寺周边地区的范围依然困难重重。

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院的裁决基于两个规则，即公平原则以及对地图的默认和禁止反言原则。这个裁决并未终结两国的边界争议，泰、柬双方的边疆纠纷本来就是因欧洲殖民帝国根据“科学或政治的权宜之计”制定的地图边界引发的，这种划定边界的规则就从来没考虑过“公平原则”。国际法院在裁决该纠纷的时候，却运用“公平原则”。曾经的殖民者摇身一变成了正义的法官，两相对比其反讽性不言而喻。

四、结 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有大量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成“新国家”。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些事实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以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已经远离了这些“新国家”。以地图政治为中心主题，剖析欧洲领土占领型殖民帝国利用地图制造边界，给这些“新国家”留下了大量的边疆政治问题。由此可以发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仍然游荡在世界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影响是这些“新国家”难以集中精力致力于本国发展的主要根源。因此，“新国家”要想拥有光明的发展前景，必须有针对性地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影响。

(白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彬彬]

^① 参见曾安安：《国际法院裁决：柏威夏寺问题的终结？》，《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